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史金波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很多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制并使用了民族文字,形成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成为中国古籍具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古籍对推动、发展民族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为光彩夺目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内容。

近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逐渐引起国内外专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外国“探险队”和传教士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掠夺,引起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和重视,开始搜集和保护这些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民国时期一些国学巨匠和前辈专家如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赵元任、季羨林、王静如、方国瑜、傅懋勳、马学良、岑家梧等先生,或搜集文献,或解读文字,或诠释内容,或探索文化,筚路蓝缕,收获粲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备受重视。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开始系统认识、全面介绍少数民族文字及其文献。当时第一次将全国各地研究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专家们汇集在一起,同时也开始把各少数民族文字及古籍状况汇集在一起。当年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破天荒地举办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用近千件文献、文物、图片向国内外展示琳琅满目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及其古籍,国家有关领导、很多专家和广大民众以及外宾都来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及其古籍引起更大的反响和更多的关注。后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还编纂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第一次全面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及相关的300多种文献^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陆续出版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共5集,介绍、研究少数民族文字及其古籍。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走上了更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整理、出版了大量少数民族古籍。近些年来,综合、系统研究少数民

^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汇编、傅懋勳主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族文献的论著不断出版^①,介绍、研究某单一文种古籍的著述更是层出不穷。

一、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研究要更加重视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少数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既具有特殊的学术和版本价值,又在保护、整理、研究方面具有特殊困难。

1.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特殊学术和版本价值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负载着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录着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以及共同发展过程和各民族对祖国的历史贡献。这些往往是汉文文献中所缺乏的资料,是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各民族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这些古籍对正确认识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年代久远,如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公元2世纪写在桦树皮上的佉卢字《法句经》,出自楼兰的佉卢字帛书也是2世纪遗物,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可与汉文早期的简牍、帛书古籍相媲美^②。又如著名的焉耆—龟兹文剧本《弥勒会见记》,成书约在5—6世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③。在现存浩如烟海的汉文纸本古籍中,这样早期的文献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藏文有8—10世纪吐蕃时期的古籍,回鹘文、西夏文有11—13世纪的古籍,成书年代距今有上千年或近千年。有些民族文字古籍本身时代较晚,但其内容却反映着一两千年前的文化,如彝文等古籍。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大大丰富了中国古籍的材质、书写和装帧类型,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独具的特殊艺术价值。少数民族古籍很多采用了与汉文古籍不同的材质,除普通纸质外,还使用树皮、兽皮、贝多罗树叶(贝叶)、当地土纸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有独特的写刻方法,如用竹木等硬笔书写,用金属尖笔在贝叶上刻写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还创造了特殊的装帧方式,如梵夹装主要用于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还有西夏文竖写梵夹装式,有藏文横写蝴蝶装式等。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研究所存有一部傣文贝叶经《羯磨说》,系将傣纸剪裁成贝叶经状,用牛血蒸泡,晾干后刷上若干层树胶,最后用金粉或银粉写成。据说这种制作工艺已失传。

①如吴肃民:《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魏忠:《中国的多种民族文字及文献》,民族出版社,2004年。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中华书局,2008年。

②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③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文》,《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3期。另一部20世纪初被德国探险队发现的《弥勒会见记》藏于德国。

2.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整理和研究中存在特殊困难

中国的古籍保护、整理和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问题更为严重,更加突出。

在古籍保护方面,主要是少数民族古籍底数严重不清。有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存单位对所藏古籍尚未进行系统整理、鉴定、编目,特别是一些文博、宗教部门古籍普查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有些部门虽已做过初步整理,但登录尚待规范,需要从版本学、目录学的角度进行完善。有的古籍虽然保存在图书馆系统,但由于所在馆不熟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尚未做应有的整理、编目。少数民族古籍保存分散也是底数不清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不少古籍保存在民间,调查、编目更为困难。如果进行全面普查,工作量将相当大。

此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老化、破损十分严重。与大部分汉文古籍长期保存在条件较好的图书馆不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存粗放,条件恶劣。近代出土的北方民族文字古籍,千百年来长期埋藏在地下,出土时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残本、残卷、残叶较多;出土后,有的因保存条件差,残损愈甚。南方民族文字古籍很多自民间采集,原来多存放在村寨民居,室内潮湿,烟气侵蚀,加之虫咬鼠啮,往往变质损坏。少数民族古籍材质的特殊性,更增加了保护和修复的难度。除纸质外,少数民族古籍有贝叶、皮革、树皮等质料,修复很难;即便是纸张,往往因其是当地土纸,修复也颇不易。与汉文书籍修复工作比较,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更缺乏修复人才和经验。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存分散、系统繁杂也增加了保护的困难。少数民族与汉族比较,人口相对较少,而所居住地域广阔,加之过去图书缺乏向图书馆系统集中的过程,保存相当分散。从保存单位看,图书馆系统保存的少数民族文字出土古籍不一定是多数,很多保存在文博系统的各级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管所,不少搜集的古籍保存在各级古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档案馆,学校、寺院也是保存古籍相对集中的单位,个人收藏的也不在少数。

最后,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流失十分严重。清末以来,大批古籍流失海外。因很多少数民族地处边疆,古籍流失首当其冲。如佉卢字文献除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200件木牍等文书外,其他800多件文献多藏于英、美、法、印度、俄罗斯、瑞典、日本等国。西夏文献被俄罗斯掠走8000余编号,数千卷册,而国内仅存不足200卷册。近些年因文物、古籍走私猖獗,又有不少古籍非法流失国外。

从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看,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问题更多。过去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多处于初步整理资料、大致介绍内容的阶段,系统、规范地整理古籍,科学、深入地研究古籍,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和特质还很不够。更为突出的是缺乏专业人才。要深入了解某一种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某一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首先要熟悉该种文字,不仅要熟悉字母、拼音法则或单个文字,还要了解其语法,达到可译释的水平。此外还应熟悉该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以便真正了解古籍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还应具备版

本学的知识,以便从版本学的角度鉴定古籍的真伪、价值和版本。既掌握民族文字、熟悉社会历史,又了解版本的专家非常缺乏。有的文种,特别是死文字,目前很少有人熟悉,有的甚至无人懂得。有的文字和文献虽然我国有专家研究,但还达不到国际水准,有的研究成果尚未被国内学界认知。有的文种文献丰富,虽有专业人员队伍,但与文献存量相比,则凸显人才不足。大力培养民族文字整理、研究专业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近些年不少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出版加大了力度,如云南丽江出版纳西东巴文古籍、楚雄州出版彝文古籍都是上百部的系列丛书。但仍有不少地区民族古籍出版仍然很困难,需要予以支持。

二、继续下大力气普查、搜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自 2007 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古籍保护工作,成立了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挂牌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在这种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古籍普查。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字种类多样,创制、使用时间不一,文献存量各异。其中有的早已停止使用,文献多是近代考古出土或发现,如佉卢字、焉耆一龟兹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字古籍,因其年代久远、存量甚少、价值很高,多为珍贵古籍。一些民族文字创制、使用时间较早,并行用至今,如藏文、蒙古文等。其早期古籍年代久远,存量相对较少,后期存量丰富。一些民族文字虽创制、使用时间较早,如彝文、傣文、纳西文、尔苏沙巴文、水书、仡佬文、察合台文等,但未见早期古籍;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使用时间较晚,如满文等,但也不乏珍品。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系借用或改制汉字而成的方块字,多数典籍缺乏或难以断定文献形成时间,如古白文、古壮文、老布依文、老侗文、老瑶文、老苗文等。还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合璧的多文种古籍,包括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古籍,也包括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古籍。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除现存于各有关单位者需要有步骤地按要求逐步进行普查外,在民间仍有很大存量,发现新古籍的空间广阔。近年云南民族大学的“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课题,对云南文山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丽江市、昆明地区几十个村寨保存的傣文、彝文、纳西文、佤文、普米族用藏文等古籍进行调查,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其中一个傣族村寨寺庙就保存近 200 种傣文古籍,有的个人保存 60 多种古籍。在调查的彝文古籍中有不止一种清代乾隆时期的写本。可以想见,整个云南省,乃至整个少数民族地区会有不少民族文字古籍仍然散落在民间。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很多古籍在民间保存条件不好,古籍的搜集带有抢救性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普查、搜集宜早不宜晚。

近两年来调查以前未知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新的

突破。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现有 56 个民族,历史上的民族更多。到目前为止,已知历史上曾使用过约 30 种古文字,但这个统计可能并不完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及其古籍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可能还会有新的文种及其古籍发现。过去有的民族一直认为没有文字,当然也不会有古籍。近些年不明文种文字不断发现。前几年有专家在湖北土家族地区发现一种方块字文献,不同的字约 1500 个左右,当地称为“陈书”。其文字利用汉字笔画,但并未用汉字偏旁部首,是一种尚未解读的文字,很可能是少数民族文字。四川省乐山地区发现有简单图画和符号类型的文字文献。贵州省北部仡佬族地区先后搜集到两种相同文字的文献《九天大濮史录》和《濮祖经》。专家进行仔细考察、分析,认为这种文字是成熟的表意文字,与汉字有一定渊源,所记录的内容反映了仡佬族的历史文化,是有重要价值的仡佬文古籍。重庆东南部地区也发现了新的未识文字书籍,称为“天书”。这是在土家族地区发现的书籍,其文字很有特点,与汉字关系很大,很可能是原来记录土家族语言的一种文字,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些情况使我们感到很振奋,可能意味着一些过去认为没有文字的民族曾经使用过文字,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可能要增加新的品类,对一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要重新认识。有的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一些不明文字的文献、拓本等。在普查、搜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过程中,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慎重态度,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或暂时不能识别的古籍,不能采取漠视的态度,更不能采取轻易否定的态度,而是要细心调查,认真研究,暂时不清楚的问题应邀请专家,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得出科学结论。另一方面,也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或匆忙结论,或拔高炒作。对古籍的内容、版本一定要仔细鉴别,据实认定,不可人为渲染。经研究目前仍不能确定其文种,也难以估量其价值的,应先行妥善保护。

近些年贵州省水族比较集中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县在搜集水书古籍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搜集到的水书古籍数以万计。其中在荔波县水各村乡发现一部水书,布面,线装,上下有单栏,有的页面有版心,并有上下双鱼尾,墨色深厚,书写工整。有的专家认为是明弘治年间的水书木刻本,并多次公开报道。仔细查阅此书后发现各页版心或有或无,笔画虽极力模仿刻本,但手写痕迹明显,因此认为它不是刻本,而是用硬笔书写得比较规整的抄本。

三、做好少数民族古籍的定级保护工作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量庞大,各保存单位多未进行定级保护,因此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进行定级保护是一个新的课题。对古籍只有分类定级后才能依据不同的类型、级别进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和保护,对那些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特别珍贵者,给予特殊条件,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和保护措施,使之存留久远。明确古籍等级后,才能对那些有特别重要价值的古籍优先抢救、优先保护、优

先修复。特别是在人力、财力皆显拮据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存单位,这点更加重要。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甄别、定级难度大,不确定因素多,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 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考察

过去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了解偏重于内容,在今后开展的定级工作中,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要全面考察,除注重古籍内容、学术价值外,还应加强对古籍版本的考察和著录。古籍的版本包括时代(编写时代、成书时代)、作者(编者、译者、校者)、序言、跋、批校、题款、牌记、钤印、版式、装帧、存卷等。古籍的年代是确定其历史价值的重要尺度。汉文古籍有标注年款、版本状况的传统,很多典籍传承有序,便于确定其时代。加之历代对汉文古籍不断著录,各时代典籍底数较为清晰。历代文人对文献研究考证较多,不断总结各时代、各种类型书籍的特征,因此即便没有明确时代标注的古籍,往往也能据成熟的经验确定其版本时代。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写本较多,很多没有标示出成书或抄写年代。比如纳西东巴文上万册古籍中有具体年款的仅有80多册,可谓凤毛麟角^①。不能确定成书时代的古籍,成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的难题。对于没有年款和缺乏明确时代标志的古籍,可从书籍内容、传承情况、纸张年代、文字特点等方面综合考察,并与同类有时代标志的文献相比照,确定其大致时代。如仍难以确定,则宜暂时搁置。序言、跋、批校、题款、牌记、钤印等往往记录着古籍成书背景、作者情况、写刻年代、名人批校、流传过程、藏书状况等,这些也联系着、甚至决定着该古籍的价值优劣。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除文种多样以外,形制也纷繁复杂。不仅材质范围超过汉文古籍,版本装帧形式也种类繁多,除卷装、蝴蝶装、经折装、缝绩装、线装、梵夹装外,还有难以用传统的版本学术语描述的装帧形式,如藏文横写的蝴蝶装、西夏文竖写的梵夹装,以及于阗文横写的经折装、傣文横写上部线订装等。察合台文文献的装帧形式现在申报材料中都记为“线装”,其实这类古籍和传统古籍的线装形式很不相同,那是从中亚地区借鉴流传过来的一种类似西装书的形式,不少以牛羊皮做封面。

既了解了古籍的内容,又了解了古籍的版本,才能说是全面了解了这部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不计流失到国外的,仅存于国内的有大约不下数十万卷册,这样庞大数量的多文种古籍分定等级,显然是一件耗时、耗力的艰巨任务。目前十分缺乏熟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的专家,需要定级的古籍数量与能参加定级的专家不成比例。

^①赵世红:《关于东巴古籍定级的若干问题》,《民族图书馆学研究》(四),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

2. 对古籍所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价值进行综合考察

在古籍定级时历史文物价值侧重以版本产生的时代为衡量尺度,有时古籍产生时代不明或产生时代较晚,但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很高,则亦可定为较高级别。如国家图书馆和云南省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所藏纳西文的《东巴舞谱》,内容十分重要,版本十分精美、古朴、稀见。又如前述傣文《羯磨说》用特殊工艺制成,其版本已为孤品。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藏拉萨版《甘珠尔》,刻印于1920年至1934年,虽时代较晚,但是当时地方政府组织编纂的巨帙原本,其内容、装帧形式均为传统古籍,具有代表性。这些皆应定为较高级别。这也符合定级不唯时限的原则。南方一些民族地区对典籍有抄新焚旧的习俗,使较早的古籍难以传承。如彝文《宇宙人文论》是早期彝文著作,记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人类起源以及万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传世版本仅存1939年抄本,时代晚近,但它是目前所知唯一传本,著名学者马学良教授认为它“是一部珍贵的彝文历史文献”^①,也应考虑定为较高级别。但这类文献定级要认真掌握,从严戒滥。

3.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残本、残叶问题的处理

根据历史、学术和艺术的三性原则,定为较高级别的古籍一般应是完本或比较完整的版本。但有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自地下出土,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过去使用文字较早,古籍早年埋藏于地下或封存于建筑遗址内,因年深日久,出土时残本、残叶较多。这样的残本自然会降低其艺术价值,影响其定级。但有些残本时代很早,内容重要,并有其特殊价值,也可考虑定为较高级别。如新疆博物馆藏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是一部残本,仅存44叶(88面),且被火烧过,残缺严重,甚至没有一页、没有一行完整,但它成书于5-6世纪,年代久远,是国内外所存焉耆一龟兹文中最长的文献。又如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文《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盛用总持》,仅存4叶写本,但其中有经名、西夏仁宗施经题款,又有西夏天盛己巳元年(1149)款识,为海内外孤本。这些皆可定为较高级别。

4. 重视多文种合璧古籍

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合璧的古籍为多文种古籍,包括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古籍,也包括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古籍。多文种合璧古籍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凸显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这种古籍是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一大特点,为中国古籍增色不少。现存的多文种合璧古籍也显示出多样性,如其中有龟兹语-回鹘语对照字书,时代约为3-9世纪;12世纪的西夏文-汉文双解四项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应是世界上最早的双语对照双解词语书籍;明清时期编辑成系统的《译语》,使多文种合

^①罗国义、陈英译,马学良审订:《宇宙人文论》,民族出版社,1984年。

壁古籍有了新的发展;清代合璧古籍涵括文种更多,有满文、蒙古文、汉文、藏文四种文字合编的《四体合璧清文鉴》,有满文、蒙古文、汉文、藏文、维吾尔文《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则包括了六体文字,除上述五种外还有托忒蒙文。对多文种合璧古籍仅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的,一般可列入该种少数民族文字内定级,对两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或三种文字以上的古籍可单独设“多文种古籍”一项定级。

5.其他

少数民族使用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等印制、书写的古籍,或成书于国外,但已被境内民族视为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古籍,亦应视为中国古籍,予以定级保护。在已批准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除第一部分《汉文珍贵古籍名录》、第二部分《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名录》外,特立第三部分《其他文字珍贵古籍名录》,收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清真寺藏13世纪写本《古兰经》一部。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是一件新的工作,定级的难题也是研究的课题。现在从事少数民族古籍研究的专家们也需要在接触、阅览更多的古籍过程中,在定级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提高,摸索、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逐步创立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版本学。

少数民族古籍定级难度很大,既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抓紧进行,保持一定的工作进度,但又不可操之过急,影响定级质量。

四、发掘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文化价值

古籍的搜集、整理和保护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近些年来搜集、整理、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工作进展比较快。保存文献较多的藏文、蒙文、满文等古籍,整理出版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西南地区纳西文、彝文、水文等古籍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成绩显著。过去的一些古籍较多的死文字,如西夏文文献,无论流失海外的,还是保存在国内的都已大部分出版。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研究工作应适时跟进。

我们说一部古籍很珍贵,价值高,其根据来自对它深入的个案研究。一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记录着什么样的重要内容?对该民族的社会历史,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揭示和研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有哪些特殊或独到的价值?这些都需要科学、缜密地研究。这种研究不仅需要少数民族文字十分熟悉,还需要有与古籍内容相应的专业知识,这是一件难度很大又必须做好的工作。学术界期待着一批有分量的研究少数民族古籍个案的论文和专著。这种研究不仅能推动古籍本身的研究,也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学和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学的建立夯实基础。

不少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已经专家深入研究,证明确有重要学术价值。比如: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藏文古籍,除大量佛经外,还包括敦煌本吐蕃历史文

书,其中有大事纪年、赞普传记、小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这些历史文献对研究 8-10 世纪吐蕃历史和社会有重大价值。经国内外专家多年研究,不断深入开掘其中内涵,这些重要藏文古籍显现出揭示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作用^①。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其卷末附有一篇元朝皇庆元年(1312)刻印的长篇发愿文。经翻译、研究得知,其中记录佛教在西夏流布和译经的情况。这些资料成为西夏佛教史的重要基础,是其他汉文、西夏文资料中所无^②。

达日玛·固什著作的蒙古文《金轮千辐》,又名《黄金家族世袭谱》,记述成吉思汗及其诸弟后裔王公系谱为主,兼及卫拉特蒙古首领的系谱,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蒙古历史,有许多重要的史料为汉文文献及现知蒙古文文献所不载,尤其是元末至清初的蒙古历史及蒙古与西藏关系史方面的资料更为稀缺,是 18 世纪蒙古族的代表性历史文献。

《满文老档》是清代皇太极时期以满文撰写的官修史书,记载了清早期的历史,包括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在东北广大地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八旗兵制和后金政权等一系列活动,进而与明王朝相抗衡,入扰京师周围各城镇屯堡的史事。其中很多重要资料是汉文文献所缺乏,至为珍贵,已全部译成汉文出版^③。

彝文《指路经》属宗教类文献。彝族宗教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要回到祖先的原居地,因此要请毕摩给死者的灵魂念《指路经》,指引亡魂回归故乡之路。《指路经》指示死者所属彝族的迁徙路线。不同彝族地区的人们有不同的送魂路线,因为他们的迁徙路线不同,但各地《指路经》的终点都在同一地点——兹兹普乌(在今云南省昭通地区)。经几代专家研究,依据不同地区的《指路经》可以勾画出彝族各部分的总发源地和分别迁徙路线。

以上所举数例,仅是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几个代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深入研究将会使我们大开眼界,了解很多新的知识,认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①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②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第 1 期。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 年。